

清理与重构: 吕思勉的神话研究*

李 娟

【提要】 上古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关上古神话的研究更引起了广泛关注。吕思勉利用文献考据、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及“统属思维”塑造的“同质人类群体”的概念,对上古神话进行清理和重构,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新解释,并尝试以此取代传统思想中有关上古神话的“旧常识”。这种新旧知识迭代背后隐藏着吕思勉以“统属性思维”取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理路,是近代新史学打造学科话语体系的尝试,也彰显出历史学家普遍面对的“当下主义”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于历史知识迭代的意义。

【关键词】 吕思勉 神话研究 历史知识

历史由一个个历史事实组成,站在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所有历史事实“都是一种思维过程的结论”,^①是一种知识。一切历史知识都不是简单地从过去“搬运”而来,而是要经过重重的选择、判断和表述。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学家思维的结果。因此,历史知识也同其他知识类型一样,不仅有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环节,也存在新旧迭代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是简单的新旧、真伪交替,更折射出背后深刻的知识体系的变化。旧知识总是镶嵌在某种更稳固的思想体系之中,以“常识”的面貌出现;新知识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与其说在于新知识本身,不如说在于新知识所依托的全新思想体系对旧体系的颠覆。此外,并非所有新知识都能获得广泛的认可并进入常识系统,这其中还牵涉学者、受众和社会的选择互动等复杂的知识社会学问题。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摆脱了神话的国家,神话与史实的区别“到汉以后始分了开来”,造成神话在记载上“斩然中绝”。^② 仅有一些神话,在经历哲学化和历史化的过程后也变得相当贫乏,无法形成完整的神话体系。20世纪初,在西方学术思潮和诸多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对神话的新型研究在中国兴起。除了诸如茅盾、鲁迅等以文学留名的学者涉足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诸多新式历史学家也用功颇深。尤其是后者,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基本原则,以“疑古”和“辨伪”为工具,形成了所谓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主要学者有杨宽、童书业等人。^③ 吕思勉也是其重要代表,其神话研究大体集中在《读史札记》《先秦史》《吕著中国通史》之中。

时至今日,历史学对上古神话的研究越来越倚重考古材料,而书写、传播中国神话故事的责任则多由文学家承担,另有为神话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的神话学,三者分工不同,互为倚仗,共同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编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② 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顾颉刚全集》1《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5页。

③ 参见刘锡诚《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建构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重要部分的上古神话。从近代史学发展角度来看,这种研究领域的分工,恰好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区分“事实”和“价值”的过程,而这两者的分离则是近代历史科学的核心特征。吕思勉的神话研究正是该“驱魅”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简单的史实清理和重构,更彰显了背后新旧思想体系的迭代。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吕思勉神话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一、新旧三皇五帝系统

神话在何处终结,历史就从何处开始。于中华文明而言,神话与历史最为杂糅之处,莫过于三皇五帝。在此之前,盘古开天辟地,为神话无疑;在此之后,夏商周世系更迭,至于共和元年,已有确切纪年,实为历史无疑。唯有三皇五帝这一段,是神话故事和历史事实交错之地,也是价值观念和历史信息竞争之所。因此,对于20世纪重新研究、整理国史的新史家们来说,作为历史开端的三皇五帝具有重大研究意义,吕思勉的神话研究也基本以三皇五帝为核心展开。

与此相关的史料有两个特点:一是很多材料被古代士大夫们认为“言不雅驯”而遭到删节和篡改,二是关于三皇五帝排序及世系的讨论多见于经学中。^①因此,要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披沙拣金”,将三皇五帝的历史轮廓勾勒出来,首先面临同经学三皇五帝解释系统的竞争,同时,提出新解释意味着新的史料判断标准和底层逻辑。正是在这两套系统的竞争中,吕思勉逐渐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必需的研究规范和边界。

通过爬梳材料,吕思勉认为传统思想中存在多种三皇五帝的说法,^②而且三皇五帝的传说早就产生了。到了汉代,儒生把这些传说和制度设计(改制)、总体的世界观(天人)杂糅在一起,弄得愈发神秘。故此,吕思勉总结道“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矣,托诸天地人,盖儒家之义也。”^③此外,无论是三王、九皇、六十四民,都是董仲舒一派为“三通说”打造的理论,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④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是古人为华夏文明“设定”的历史起点,其意义不在陈述事实,而是通过对上古“黄金时代”的浪漫想象,按照某种逻辑编排上古历史,以达到昭示历史规律、定位当下、预言未来的现实目的。

为了厘清华夏历史开端的这段故事,吕思勉对这些神话人物和事迹进行了历史考证,吸收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化理论,将三皇五帝划分为三皇和五帝两个历史阶段。“吾国开化之际,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即三皇时代。^⑤这些称谓都不是特指,而是“德号”或“地号”,前者为功业,后者指居地。德号不专属于某人,而是“代表社会发展开化的某阶段”,或者发明巢居、取火、佃渔和耕稼的某些先进部族。居地则由于古代地名往往和部族名称相混,且部族多有迁徙,因此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只能大体推知起于今天山东东南部。^⑥到了五帝时代,历史记载相对多了一些,吕思勉

①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8册《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② 吕思勉总结“三皇异说有六,五帝异说有三”。参见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26—27页。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27页。

④ 参见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24—26页。

⑤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44页。

⑥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2册《吕著中国通史》,第251页。

提出五帝时代的主要历史线索有三:一是部族相争,先是炎黄二族相争,^①随后是黄帝与共工二族相争;二是尧舜禹的禅让;三是治水。这些历史线索中包含着吕思勉对上古历史发展的几个基本认识:中华民族文明兴起于东方;上古并非“黄金时代”,而是部落频繁相争的蛮荒时代;大禹之后文明逐步西迁。需要指出的是,吕思勉的这些研究结论只是近代以来对于上古神话的众多研究成果之一,并非全然无误、无争议的结论,但讨论吕思勉研究成果的合理与否,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并不展开。^② 这些线索和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源于吕思勉对史料的细致爬梳和考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学新思维模式介入的结果,下面将就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二、神话史料的三种清理

吕思勉勾勒出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基本轮廓,与传统儒家学术系统中的形象截然不同,明显更加接近近代历史科学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吕思勉也是在重新解释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重新建构上古历史的工作。这项工作总体而言,就是对经学和各类古书进行史学化、史料化处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二是重构。

本文为研究之便将清理工作分为三类,以强调清理工作的三个不同侧重点。当然,在实际研究中,这三类往往彼此纠缠交叠。

第一类是针对那些并非刻意造成的史实错误。如,有关舜逝世地点的记载,《礼记》记舜崩于苍梧之野,《孟子》记舜崩于鸣条,《史记》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而葬于零陵。吕思勉认为,首先,《孟子》和《史记》在这一问题上都引用了《尚书》的说法,因此都应该包含苍梧、鸣条这两个因素,可能后来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省漏;其次,前人认为鸣条靠近南岳,所以顺带认为舜的陵墓就在湖南零陵,但古人以安徽霍山为南岳,南岳衡山是后来才有的说法;最后,根据中华民族起于东南的基本原则,鸣条在安徽和湖南这两种说法都是后起之说,其应该在古代兖州境内。^③ 不论吕思勉的这番考证正确与否,对于这一类史实性错误,古往今来学者们的考证方式基本相差不大,而且尽管在古书中频繁出现,但在吕思勉看来这些并非是致命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各类史料(包括考古材料)的爬梳和逻辑推理进行清理。

第二类清理工作则要棘手得多,因为它针对的是那些后世出于各种原因进行的附会,与上一类史实错误相比,具有极强的“刻意性”。如,后世所谓陕西黄帝陵、黄帝登仙处、黄帝都城陈仓、黄帝登崆峒山等。吕思勉认为黄帝出于东方,最远到河南,绝不可能到秦陇一带。这些附会皆因“帝王之所信,则无冢者可以有冢,而祠祭且因之而起矣”。^④ 这一类清理工作之所以更加棘手,不仅因为“处处牵引地理”,冒充史实的姿态与其他史料混杂一处,更是由于为统治者所力主,又与民间信仰及文化

① 吕思勉提出,“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参见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50页。这种观点早有争论,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指出,应遵从《史记》的看法,将其分为二人,先后与黄帝战。参见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册,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4页。目前学界主要有炎帝族说、东夷族说、苗蛮族说、古吴族说和中原土著部族说等。参见金荣权《蚩尤与炎黄之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② 相关的总结性论文,参见汪楠《20世纪上半叶中国神话学史》,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叶庆兵《〈史记·五帝本纪〉系列人物神化史化考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7年;田桂丞《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淮北师范大学,2016年;谭佳《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55页;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65页。

④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38页。

糅为一体,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的拥趸。这一类清理工作,对于史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不再以讹传讹,尽可能扩大自身清理工作的影响力,等待集体记忆的慢慢变化。因此,从根本上而言,也并非绝无可能之事。此外,这种附会也并非毫无价值,关于这一点内容将在后文讨论。

相比前两类清理工作,第三类清理工作针对的并非事实性错误,而是传统史学的一些基本逻辑,尤其是通过某种观念系统或者史事类比,将价值附加其上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而这也让原本就存在夸张、变形、残缺的神话变得更加云遮雾绕。清末民初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区分古代文献中的“价值”和“事实”。^①上古神话材料中的这些“价值”,作为后人对神话合理化、道德化而附着其上的云雾,也正是吕思勉神话研究的重点考证对象。

例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故事。这一故事的基本梗概虽然比较清晰,但在法家、儒家和魏晋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史记》继承《尚书》将禅让揭示为尧舜心系天下,故传位给更加德才兼备的人。禹的儿子启本就颇具人望,加上之前选定的皋陶逝世,益辅佐禹的时日很短,于是禹崩后,启为人心所向,继承帝位。根据这一叙述可知,在儒家认知中,禅让凸显了上古贤王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是立德不立嫡的表率,是构成儒家政治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呈现出一个解释循环:上古帝王皆“圣王”,以天下为先,故行禅让,而禅让反过来又证明了上古帝王为“圣王”。在这一套逻辑中,“圣王”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但是,这段故事在法家思想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韩非子》中的《说疑》和《五蠹》两篇就提出两种看法:前者认为古代禅让其实都是争夺帝位的权力斗争故事;后者认为古代君王其实是个苦差事,所以禅让是将重担转移给他人。吕思勉认为这两种解释皆是寓言,“一以著奸劫弑臣之戒,一以明争让原于羨不足之情,皆借以明义,非说史实也”。^②这两种解释都是禅让故事放在法家权力观念下的产物,以昭示法家对权力和社会发展的理解,并非史实。

儒家和法家对禅让的解释,均是将其作为各自观念系统中的一个例证,分别证明“以德化民”或“以法为治”的政治主张,均可视为“画鬼捉鬼”的循环论证。魏晋时期对禅让故事的质疑,则更为复杂、深刻。据《晋书》汲冢出土的竹书记载:“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③更有舜囚禁尧和丹朱的说法。^④又有《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记载,魏文帝即位时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⑤这种说法更不免让人心生联想,似乎进一步坐实了禅让乃权力斗争的观点。吕思勉首先否认了汲冢竹书的真实性,认为汲冢出土文物可能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实物流传后世,因此无法断定其真假。接着指出,汉魏之际权力更迭,有董卓和司马懿篡权,时人便推今及古,认为尧舜禹之间的权力更迭也是如此。而古今迥异,不能因为后世有董卓、司马懿之流,就推测上古尧舜禹时代也是纷争若此,但也不能说上古帝王皆是“天下为公者”。魏晋时期文献造假成风,士大夫以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认为两汉儒者拘谨虚伪,甚为可恶,于是“好为非尧舜、薄汤武之论”,又有汲冢出土

① 这一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纠结和困境。参见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66页。

③ 《晋书》卷51《束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2页。

④ 参见《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页;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3《疑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⑤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6页。

书籍一事,便将自己的这种看法附和其上。^①因此,魏晋时期对禅让故事的解释,表面上是通过当时新出土的汲冢竹书提出的,实际上是通过古今史事的类比完成的。这种类比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和士大夫的政治心态密切相关,颇可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很明显无益于我们了解上古禅让制度的真实情况,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引以为戒的思维方式。

克罗齐曾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为我们指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由于研究者本身是所属时代的产物,只能从自身和时代出发理解历史,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笼罩在个人和所属时代的气息之中。按照这种理论,无论儒家、法家,还是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对于禅让故事的历史解释都具有合理性。吕思勉的批评,实际上正是针对传统史学中这种“当下主义”分量失衡的问题。或者说,在吕思勉看来,历史学自有其伦理和操守,历史中有一些东西不会随着研究者的视角转变,也不容人随意解释和更改。正是对于这一点的坚守,吕思勉走出了经学神话体系,但也由于对这一点的坚守,让吕思勉的神话研究陷入了另一重“当下主义”,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加以论述。此外,无论是“画鬼捉鬼”的循环论证,还是上述类比逻辑,恰恰是传统史学构建历史解释的重要方式,也是近代科学历史学需要极力反思和澄清的内容。

三、神话史料的三种重构

重构主要针对包含有用信息的材料。吕思勉指出,这一工作的大原则是:尽管汉宋之学、古今文之学各有优劣,“然因治古史而取材,则一切古书,皆无分别”。^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仅仅将古书中的材料原样录出,就达到了治史的要求。相反,将某种材料“史学化”和“史料化”的本质,是将其剥离出原来的知识体系,放置在另一种体系中进行重新解读,这便是第一种重构工作。

以禅让故事为例。吕思勉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断定,这“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因为“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④而在稍后编成的《中国社会史》中,他承认古代曾经历过“原始共产之世”,上古的君位继承,“亦有群族所奉,出于公推,不必即为一族之长者,此即选君之制”。^⑤最后,在1939年到1941年写作的《吕著中国通史》中,吕思勉提出:

尧、舜、禹的相继,乃王位而非君位,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阙。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⑥

可见,吕思勉对古代禅让问题的观点存在从否认到承认的转变,这反映了学者本身所处时代史学观

①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63页。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13页。

④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册《白话本国史》,第22—23页。

⑤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4册《中国社会史》,第259页。

⑥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2册《吕著中国通史》,第252—253页。

念的急剧变化。不过,从更加根本的层面上来看,这一转变实则从一开始就以历史进步观念为支撑,并最终将这段故事放置在人类从“共主”到“家天下”的普遍发展进程中进行解释,背后支撑的原则是“社会普遍发展史”,即“人类本性是相同的,在相类似的环境中,会产生类似的文化”。^①这种解释抹平了禅让具有的特殊性和道德价值,也就取消了上古统治者的“圣”和禅让所具有的“德”,区分了“事实”和“意义”,从而拥有了似乎更加接近近代科学历史学的面貌。^②

此外,这种诉诸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过程的解释体系,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推论,即由于抹平了“圣王”和“常人”之间的差异,代之以抽象的“人”,由此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或常识在材料判断中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传说中黄帝有“九功”,《尚书序疏》认为这些并非都是黄帝之功。吕思勉认为,《尚书序疏》的这种说法尽管“为强伸《伪序》文籍起于伏羲时,虽不足论,然就《系辞传》文义论之,自为平允。然黄帝以降,文物日臻美备,则可知矣。此史事之传者,所以至黄帝而较详也”。^③吕思勉之所以认为《尚书序疏》的说法较为“平允”,并非依赖于某些更为坚实的证据,而是依赖于人的一般常识,即所谓的“九功”关乎社会文明发展的各个方面,绝不可能是一人所创,甚至不可能是一代人所创,应该是逐渐发展完成。但是,古书多有“黄帝创九功”之说,也从侧面证明了黄帝之后社会发展日益完善,自此以后的史事也越来越详细。

第二种重构涉及材料的“历史化”,即将这些史料本身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尤其是那些后人鉴于当时情形而进行的附会,尽管不实,也是“一大发明”。^④如,《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郑玄于黄帝、颛顼之间加入少昊。吕思勉指出,此番操作正是为了按照“土金水木火”的顺序让汉为尧后,承火德。但这样一来五帝成六人,于是《伪古文尚书》从三皇中剔除燧人,以黄帝入三皇,五帝仍为五人。^⑤因此,这段材料虽无助于落实三皇五帝的客观情况,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学术系统的若干细节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这种重构借助了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之间的阐释循环,也就是说,汉代对自身的政治和历史定位是“为尧后”,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可以完美解释古文学家以“黄帝入三皇”“少昊补五帝”的具体行为。反过来,古文学家的这种行为,也能反映汉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氛围。在历史大背景和具体事件这两个方向上,只要有一个取得新突破,就有可能带动该领域历史知识的新一轮变化,这也是近现代历史知识迭代的重要途径。这种解释循环有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整个社会或时代作为一个意义整体涵盖一切个体(人或事),即不存在超然于整体背景之上,无法通过社会背景进行解释的个体。所以,历史主体看似还是一个个特殊个体,但其实已经转变成了“整体中的个体”,具有了更加抽象的意义。同时,这种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永远处于可变化、可深入的状态。正是这一点,让这种逻辑推演不同于“上古圣王”与“画鬼捉鬼”的逻辑。

第三种重构涉及被“过度历史化”的材料。吕思勉在研究中发现,传统学术除了喜欢美化上古时代以外,还喜欢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地点落实下来,也就是神话的“历史化”,但这种“历史化”有些

①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2册《吕著中国通史》,第10页。

② 这种从人类整体和社会普遍发展思考历史的方式,在近代曾非常流行。如,茅盾对中国神话的梳理,也是从原始先民“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共同的结论,再归纳其他民族的神话模式,“复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参见苏永前《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的方法论反思——以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为例》,《兰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52—53页。

④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2册《论学丛稿(下)》,第1036页。

⑤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41页。

情况下“过度”了。对这类内容,只能采取消极重构的方式,即只保留现有材料支持下的可能性结论,使神话回归神话。如,传说人物少昊,吕思勉认为“则古代,今山东省,确有一少昊其人,谓为子虚乌有者,武断之论也”。但古文学家硬说少昊就是黄帝之子青阳,就很荒谬了。^①根据吕思勉的考辨,此种说法是因为《周书》(即今《逸周书·尝麦》)称“少昊清”名“质”。因质、挚同音,古文学家由此“定少昊之名为挚”,于是刘歆在《考德》中自造出“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吕思勉据此怀疑今本《左传》中称“少皞挚”,是因为“挚”字本为左氏学者为《左传》作的注解,在后来的流传中误入正文里了。^②吕思勉承认历史上也许真有少昊此人,但古文学家“少昊—挚—青阳”的论证过程,只是因为发音近似,缺乏坚实的证据,因此并不认可。但少昊到底是什么人,已经不是历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吕思勉看似并没有重构什么,只是让少昊的身份回归苍茫,但这种不是重构的重构恰恰说明,以吕思勉为代表的近代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边界有着清醒的认知。

综上所述,吕思勉对神话的重构,是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借助进步史观支撑下的普遍社会发展理论和日常经验完成的。加上清理工作中对神话的道德价值色彩及类比逻辑的擦除和反思,基本上区分了神话中的“事实”和“价值”,勾描出了以三皇五帝为线索的上古历史的发展脉络。通过这些工作,既可以看出传统考据学方法在吕思勉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更能看出相较于传统史学,他的基本假设和判断原则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社会学家的成说”取代经学成为史学家的重要判断依据,^③这也意味着历史知识的一次重要迭代。有意思的是,吕思勉对神话中历史知识的迭代,表面上是考据学的成果,实则是通过将“旧知识”放在社会发展观的全新体系中经历“陌生化”,再转变为“新知识”的结果。这些新知识如果可以进入常识系统,也就进一步巩固了其所生发的社会发展论,帮助其成为更具社会话语权的知识体系,从根本思维方式上颠覆“旧常识”。

四、新知识与旧常识

上古神话包含着传统学术赋予的价值,逐渐成为传统知识系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神话及意义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和常识,如圣王三皇五帝、尧舜禹禅让以天下先、大禹治水拯救苍生,等等。这些常识同传统学术构建的思想体系紧密编织在一起,难以动摇。从思想上而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之大变局就是从颠覆常识开始的。神话构建的常识,在传统社会未必没有人提出怀疑,王充就在《论衡》中有大量讨论,^④但因其大多是质疑细节或提出另一种假设,并无涉于传统学术的基本逻辑,也就谈不上颠覆。但是,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却借助“赛先生”的西风,尤其是社会发展史和进化论学说,动摇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代之以“科学研究”的全新局面。在这个新系统中,旧常识或被抛弃,或经历“陌生化”从而进入新一轮常识化的进程。更宽泛地说,这种新知识取代旧常识的过程,不仅发生在史学领域,更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界经受的一场风暴,吕思勉的神话研究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新旧知识迭代的过程,存在一表一里两条线索。从表面上看,是西来的社会发展学说取代

①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54页。

②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53—54页。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3册《中国社会变迁史》,第421页。

④ 参见《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篇。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

了传统经学思想。吕思勉借此将上古神话中的史事重新解释为人类早期历史发展阶段,分离了其中蕴含的“事实”和“价值”。而从内里来看,则是以“统属性”思维模式取代“关联性”思维模式,是对以“有机整体式”为逻辑推理依据的传统历史思维方式的颠覆。^①统属性强调以事物的本质作为分类标准,强调实体与形质的静态属性;关联性则以功能为分类标准,着眼于事物内部的动态功能与相互关系。李约瑟极力强调这种“关联性思维”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②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整体论”,即宇宙观、社会论、道德观和政治论连成一片,“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秩序,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形成一个各部分相互紧密衔接的统系”。^③而且这种整体和关联本身就是真理,除此以外,再无某种更为超越和终极的源头能阐释这种真理。

这种思维模式下沉到日常生活,则强调人人都是社会组成部分,都要服务社会。这既是“为公”(政治),也是“为私”(道德),故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解释要远远超越对自然现象的探索”。^④张东荪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从文化上加紧社会团结的趋势。^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史学产生了强调人人关系、天人关系的历史书写。正如江湄所说“中国传统史学特别重视探讨人在一定历史处境下的责任与能力,一般用‘人意’与‘时势’的关系来表示……这样一套历史观的重大关切,在于‘人’在给定的历史处境下,如何抉择、如何行动才是合乎‘道’的,合乎‘道’的大意是既问心无愧,又对当下的现实最负责任最有用,同时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在道德上才算是最恰当的。”^⑥因此,历史人物或事件必然被赋予某种政治或道德价值,其意义甚至凌驾于事实本身之上。

如果以这样的思路反观吕思勉的神话研究,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有意地剥离上古神话的这种“有机整体论”,用以“社会发展史”为表现的“统属性思维”代替“价值与事实混杂”的“关联性思维”。吕思勉首先将宇宙和社会分割开来,社会发展便不再具有某种宇宙论的意义,然后以“抽象同质”人类群体代替“具体特殊”人类个体。这一点很好理解,吕思勉借此反驳“上古圣王”和“五德始终”等解释体系,驱除了笼罩在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神秘色彩,但如此还不足以让事实确立,还需要重新建立证据判断原则。传统经学的证据判断原则就在其价值观念体系之中,在否定了传统经学的解释体系后,吕思勉等近代历史学家选择以“社会发展学说”为历史证据判断原则,其核心是以“抽象的人类群体”作为历史社会发展的中心。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修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⑦梁启超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进化法则。

吕思勉的神话研究并没有走那么远,却有了具体的应用和阐发。第一,消弭圣人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如,否认存在近乎神明的上古圣王,因此三皇五帝只是部落首领,大禹治水不在九州而“只限于一隅”的事实才得以确立。^⑧第二,既然不存在超人般的圣人,那么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就成了重

① 参见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研究笔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第40—42页。

②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③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1页。

④ 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研究笔记》,第383页。

⑤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1页。

⑥ 江湄《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⑦ 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7页。

⑧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57—58页。

要的判断依据。如在大禹治水方法的问题上,根据《禹贡》《山海经》《诗经》可知,治水的基本方法是“湮防”而非“疏导”,吕思勉认为这才是更为可信的,因为“于古则湮防本最易知之法;亦且疆域狭小,无从知水之源流……所习知者,沟洫疏治之法耳”。^①根据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掌握河流的来龙去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蛮荒上古就更不可能了。后世人们治水技术发达了,重疏导而轻湮防,如此才附会大禹疏导洪水有功,而鲧和共工湮防无功。其实,他们的治水方式都以湮防为主,也都没有消除水患。大禹之后,文明西迁,水患渐消,后世便将治水的种种功绩叠加到了大禹头上。此外,上古多水患,且“古帝形貌,皆象龙蛇”,更有许多日常生活经验,“如食之主于鱼与植物也;衣之用麻丝,且其制宽博也;人所聚处曰州;其宫室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也;币之多用贝也”,^②都证明“文明肇启,实在江海之会也”。^③第三,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群体”,那么“个人权力博弈”的传统历史叙事就必然让位给社会发展史。如,由于否认了法家和魏晋时期对禅让“权力博弈论”的解释,才能将尧舜禹的禅让“还原”为社会发展从“共王”到“家天下”的过程。需要补充的是,这种传统“个体权力博弈”历史观念的糟糕之处,在于承认朝代的更迭并没有产生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而这正是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所要极力避免的。也许正因如此,近代历史学才最终选择用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发生的社会矛盾,取代了个人之间由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权力博弈,并将其作为历史发展变化的核心动力和历史解释的基本线索。

因此,吕思勉的神话研究,尽管表面上保留了传统考据史学的皮相,但内里却通过“统属思维”塑造的“同质人类群体”概念,加上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逻辑,取代了“关联性思维”下事实、政治和道德夹缠不清的解释体系。吕思勉的神话研究只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的一个侧影,非但没有提出完整的上古神话系统,在《吕著中国通史》中甚至将诸多研究成果简化为“古代的开化”一章。相比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中的“分化说”和“东西民族神话系统融合说”,^④以及茅盾的“北、中、南”神话系统和“帝俊为中心的诸神系统”,^⑤吕思勉的研究显得过于简单和碎片化。不过,也正是吕思勉在神话研究上的克制,才体现了他作为近代历史学家是如何在与传统思想及西方学术观念的交锋和融合中,逐渐清理出自己的边界,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判断标准。吕思勉最终的学术诉求是建构中国通史,而神话作为历史的开端,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是一套历史叙述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开端确定了研究的基调和时间的畛域。正因如此,吕思勉的神话研究尽管不专不博,却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如果将视野放大,可以发现,此后随着考古学和生物学的新发现,对于中国历史的开端产生了种种新的说法,这种从神话传说到考古生物的研究视野的转移,本身也正是中国历史知识迭代的一种体现。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吕思勉奉行的人类社会发展观念,也是在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一种选择。正如茅盾在讨论盘古神话时说“这便是中国神话的第一页,若照兰氏的各民族开辟神话的方式看来,中国的开辟神话与希腊、北欧相似,不愧为后来有伟大文化的民族的神

①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61页。

②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3册《先秦史》,第28页。

③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9册《读史札记(上)》,第5页。

④ 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76页。

⑤ 参见玄珠《中国神话研究ABC》,《民国丛书》第4编第59册,上海书店1929年版。

话!”^①这种东西方相似性或同步发展,一方面帮助构建了中国的神话体系,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安抚当时知识界焦虑情绪的功能。吕思勉同样认为“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乃中国与西洋之所同,而非中国之所独。具体言之,即是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要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②可见,这种选择反映了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现实诉求和心态。可以说,这也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种印证。吕思勉曾批评,在解释禅让问题上,儒家、法家和魏晋学者都犯了“当下主义”分量失衡的错误,但由于他本人对社会发展学说的深信不疑,也滑入了同样的误区。正如乔治忠批评的那样“《读史札记》在考述炎帝与黄帝之争中,不言其人其事是否可信,而得出‘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的看法,貌似撇开争议转而思考上古传说之更宏大的社会意义,但炎帝、黄帝是否真是上古人君以及所处的时代尚无着落,能够断言为‘世变升降之会’吗?”^③“当下主义”不一定是历史学的原罪,因为它体现出历史与当下的持久张力,但它的确是历史学家需要警惕的问题,因为“并非过去的一切都需要势不可挡地导向我们为自己的故事选择的终点”。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不仅要谨慎地拿捏“故事的结局和展开过程之间的选择感”,^④也需要不断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和论证方式,由此实现历史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不断自我更新。

(作者李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730000)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廉敏)

《格尔达·勒纳与美国女性史学转型研究》

金利杰著,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格尔达·勒纳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该书将其纳入美国女性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细致梳理了勒纳女性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女性史学两次转型的关系,女性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全书除序言外,共六章,分别是格尔达·勒纳女性史学形成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女性史学的独立和专业化:从玛丽·里特·别人德到格尔达·勒纳;父权制:格尔达·勒纳女性“失语”根源的历史构建;社会性别:格尔达·勒纳提高女性话语权的史学观念“普遍史”:格尔达·勒纳对女性史学发展方向的探索;对格尔达·勒纳女性史学思想的评价与反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① 茅盾《神话研究·神话杂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转引自乐黛云、陈惇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②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2册《吕著中国通史》,第228页。

③ 乔治忠《〈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④ 林·亨特《历史学为什么重要》,李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

SUMMARY OF ARTICLES

Receptions of Nikolai Bukhar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in the 1930s // Zhao Guangjun

The 1930s witnessed a great quantity of foreign work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it was common that one book had several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by Nikolai Bukharin had the mos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is book induce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book, along with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s, became source of reference in the theoriz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Meanwhile, people of the time had already noticed problems such as mechanism in Bukharin's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radually sublated his theory while continuously referring to it as source of reference. In studying the ri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view o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ory, but also trace its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Taking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sublation of Bukharin'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of receptions of foreign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The Orthodox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 Cui Zhuang

China was torn asunder by frequent wa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It becomes a focus of debate among historians on what kind of orthodox ideas to follow in order to compile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Five competing views were held by scholars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is to deem these five continuous dynasties as orthodox, represented by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Fan Zhi,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Wang Pu,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Xue Juzheng,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Ouyang Xiu. The second disregards the Liang Dynasty as a fake and only admits the other four dynasties into the orthodox tradition. *The Reign Titles of Past Dynasties* by Li Fang, *Abolishing the Reign Titles of the Zhu-Liang* by Song Shiyong, and *Preface to Questioning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Hua Zhan'en cited and discussed this idea. The third takes the five dynasties as "lunar legitimacy" or unorthodox. *Record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Wang Gao and the correspondent part of *Outline and Detail of History Retold as a Mirror for Rulers* by Zhu Xi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ourth treats the Southern Tang as a continuation of Tang orthodoxy. *Book of the Southern Tang* by Lu You and *Annal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Chen Ting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ifth regards the Later Tang and the continuous Southern Tang as orthodox, represented by *Annals of the Three Tang* by Wu Fei, *Book of the Continued Tang* by Chen Zhan, and *Tang-Song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Hua Changqing. These five views took different roots in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from political transition, territorial heritage, family lineage to moral values, all of which are, nevertheless, valid. They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of ancient scholars' unrelenting pursuit of justice, and they are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Deconstruction to Reconstruction: Lü Simian's Study of Mythology // Li Juan

The history of antiqui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 for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on mytholog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Lü Simian followed the logic that society progressed from low to high levels in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homogenous human group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latter wa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subordinative thinking". In three aspects, he deconstructed myths from the antiquity and replaced the "old common sense" 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old and new knowledge systems is Lü's effort to replace "correlative thinking" with "subordinative thinking" and to create a disciplinary paradigm for modern new historiography. A look into his study of methodology will help us not only to realize the dilemma of presentism that is commonly shared by historians, but also to recognize the generational shifts in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 The Ris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Deng Y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ulture" became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tool for reconfiguring traditional heritage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wrote cultural history aiming at exhibiting traditional China'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chievements. In viewing China in a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West, they held a hidden belief of treating culture as a battleground.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s gradually dominated the them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histor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present a national life in historical action. Not only did it exhibit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history, but it also revealed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commu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 merged into one. Cultural history, thus, became a constructed narrative fabricating social cohe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Historical Memory", "Histoire-Mémoire", or "History and Memory"?: The Use of Concepts in History of Memory // Tu Hanzhang

The concepts of "history and memory", "histoire-mémoire",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y of memory" seem similar, but their meanings vary. The term "historical memory" was first used by Maurice Halbwachs in *La Mémoire Collective*. It was originally to emphasize the nature of history as memory, and its meaning was gradually broadened to refer to "people's mem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term "histoire-mémoire" was originally coined by Pierre Nora to describe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memory" in pre-modern eras. The term "history and memory" is a central topic when historians in the west discus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In doing so, they justify the history discipline's position while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memory studies. "History of memory", by contrast, is a field that treats memory as the object of historical inquiry, studying changes of memory over time. Therefore, we should strive for accuracy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ing these terms, especially when translating or introducing Western historians' opinions.

The "Comfort Women" Ques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Gender Perspective // Liu Ping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widely adopted gender as a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o frame the study of the "comfort women" in the Japanese army within war-related sexual violence. This change induces a paradigmatic shift and further extend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scholarly inquiry. However, there is also an over-reliance upon or blind trust in the gender approach. As a result, some have replaced political history with gender history, proposing a position of transcending state/nation, and resulting in a historical nihilist tendency of challenging or even denying the brutal nature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The "comfort women" question is complex and particular. It is not only a research subject in gender history, but also a topic in political history. When using the gender perspective, we need to be aware of its limits and to maintain a sharp sense of vigilance.

Modern Reflections on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 Guo Zilin

Ancient Egypt was an extraordinary civilization tha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uman development in history. Yet, it became a lost civilization after the seventh century. Scholars hold competing opinions on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due to their divergent views on what conceptualizes a culture or a civilization, and how to define its beginning or its end. To overcome the confusion, one should look for uniform theoretical standards, and this is the baselin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hree criteria, includ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the invention of the writing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ogether define the emergenc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years. Accordingl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 three traits signified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s for its fall, it wa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reasons at work, including the decline of total national strength due to stagnation of productivity, the alien domination of almost one thousand years, the lack of social cohesion to the writing, belief systems and their practices.